刘子通与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夏慧 汪季石¹

(黄冈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 黄冈 438000)

【摘要】: 我党早期“南陈北李中刘”称呼中,“中刘”所指的刘子通是党的“一大”时湖北最早的9名党员之一,在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练中,他从传统士人转型为现代知识分子,通过改造自身和他人的世界观,为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积累了充分的理论准备,成为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彰显马克思主义革命性进行了教学育人、办刊、革新湖北教育等多种实践,为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关键词】: 刘子通 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历史贡献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8477 (2021) 03-0030-08

学界普遍认为五四前后至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主张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探索阶段,提及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创人物,时有“南陈北李”之称的陈独秀和李大钊功勋显著,本文研究的刘子通,今人则知之者甚微。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对刘子通做过简要述评,称他是“我党早期宣传家”,是“郭沫若、夏之栩的老师”,“当时有南陈北李中刘的称呼,他和董必武、恽代英等同志大革命前在武汉活动。后被军阀迫害,1924年病死在家乡”。其后至今,学界对刘子通的深入研究阙如,主要原因是刘子通逝世时间早,当时无人系统述其志事,故有关他的史料并不多见。笔者以及关注刘子通的学界前辈和刘子通的后人,经一番爬罗剔抉,搜集和挖掘到一些珍贵的历史资料,认为刘子通应纳入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群体。本文拟分析论证刘子通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既为钩沉史实,还原革命先烈的光辉业绩,同时从中认识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点和规律。

一、成为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前提条件：从士人到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探索是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的奠基阶段,这一时期的奠基人是我国最早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探索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入中国的众多西方新思想新理论中,能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传统士人抑或广义上有文化的知识分子难担其任,必须是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自觉的革命意识和独立的批判精神的现代知识分子才能承担这一使命。然而“二十世纪以前,中国基本上没有新式知识分子”,^[1]20世纪初,被学界称为“辛亥一代”的知识分子正处于艰难转型中,他们中成长为新式知识分子的不过是十五万至二十万人左右,与传统士人的规模相差甚远,在当时整个中国人口中所占比例微不足道,其后能够发展为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更是微乎其微。出生于清末光绪年间的刘子通能够从传统士人转型为现代知识分子,继而成为探索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群体中的一员,与他个人的学识素养、爱国情怀及革命经历分不开。

刘子通出身传统士人家庭,二世祖刘简“明初任黄州知府,政简刑清,建置书院,士林赖之。靖难兵起,弃官寓居赤壁下,旋徙东弦乡。服官十余年惟留书数筐而已,后裔家于黄,人称所居为‘留书湾’。”^{[2] (p77)}刘氏宗谱记载,自清乾隆朝末至清宣

¹作者简介:夏慧(1978-),女,黄冈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汪季石(1964-),男,黄冈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大别山28年红旗不倒’原因研究”(20BDJ075);湖北省社科基金前期资助项目“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口述史料搜集整理与研究”(19ZD063)

统三年止，刘氏家族子弟参加封建科考，共中进士、贡生、举人、副榜、秀才 245 人。刘子通的父亲刘德金为府学庠生，刘子通自幼便在父亲的带领下在刘氏家学“留书所”接受传统教育。刘德金面对清王朝的无能和国事的衰败，不支持刘子通参加当时日渐式微的科举考试。故刘子通少年时便开始游学黄州、武汉，他目睹黄州科场官员草菅考生命案引发的万人围堵贡院事件，亲见汉口江岸外国船只炮舰横行，结识参加同盟会的志士何自新、熊十力等，参加由暑期归国留日学生创办的光黄学社速成讲习所，聆听革命言论，阅读进步书刊，思想上逐渐脱离了传统士人的价值观念与行为体系。

刘子通的青少年时期，正是民族内忧外患之际，中国半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清朝统治集团腐朽昏庸，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激化。1905 年，父亲刘德金“命其仲子子通留学东京意在吸收外洋之文明以改进中国之社会”，刘子通遂成为湖北 33 名留日学生中的一员，在东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学习。速成师范生源于张之洞的极力倡导，“师范生宜赴东学习。师范生者，不惟能晓普通学，必能晓为师范之法，训课方有进益，非派人赴日本考究观看学习不可……”^{[3](p332)} 当时湖北选派的留日速成师范生出国前普遍具有良好的中文修养，以教育启民智也是大多数选择师范的留日学生的初衷。刘子通主动站于这股积极的历史潮流中，体现出高度的个体自觉和对时代精神的正确把握，为日后成为推翻满清皇朝和辛亥革命的生力军奠定了思想基础。

孙中山先生言“东京（留日中国）学生实为中华民国最有功之人”，^{[4](p20)} 刘子通作为留日大军中的一员，积极投身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留日期间，正值孙中山与黄兴在日创建反清革命团体——同盟会，刘子通于 1905 年 7 月 30 日参加同盟会第一次筹备会，成为第一批同盟会员，也是其中年纪最轻的几个会员之一。是年 11 月，日本政府发布《取締清国留日学生规则》，12 月 4 日，刘子通参加了所就读的弘文学院和经纬学堂等 8 校的集体罢课行动。学潮声势浩大，日本政府态度强硬，学生反日情绪高涨，退学归国的呼声日益增大，加之日本舆论界长期对中国留学生的轻视和攻击，刘子通于 1906 年 2 月回国。在同盟会湖北分会会长余诚的安排下，刘子通入武昌文华书院教书，“负运动学界之责”。^{[5](p99)} 当时，革命党人认为，组织革命队伍须运动军学两界，传播革命思想，刘子通以“结兰谱”的方式参加了好友熊十力、何自新发起的黄冈军学界讲习所，宣传革命思想。后讲习所被统制张彪封闭，刘子通随讲习所成员转入同盟会领导下的日知会。作为老同盟会员和日知会骨干，刘子通积极参加余诚组织的湖北教育会活动，当时“湖北教育会”很受东京总部的重视，余诚指示刘子通与王季芎负责湖北教育会的工作，为日知会介绍与改良派论战概况，在各学校和书院中开展活动，宣传同盟会纲领，联络与团结教育界人士。1906 年冬，因日知会策划的萍浏醴起义失败，日知会遭封，成员被通缉，刘子通返回老家避难，虽局势紧张，仍积极与外界联络，商议组织革命团体，寻求革命出路。

1908 年春节前夕，刘子通前往四川成都铁道学堂。在成都铁道学堂的三年，刘子通以教员身份为掩护，继续传播革命思想，且“在成都学生间很有声望”。^{[6](p198)} 1910 年冬，成都教育总会在四川高等学堂号召学生集会，声援北京“第四次速开国会请愿”学潮。前来开会的两三百名各校代表因初次从事学生运动，缺乏政治训练，会场混乱不堪，刘子通登台发表演讲，指导学生代表如何进行运动，得到学生的热烈拥护，大家推选他为会议主席、起草委员，会议“拨云雾而见青天，赞成的声浪在全场中沸腾了起来”。^{[6](p199)} 其中有后来参加北伐战争，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郭沫若，他称刘子通的演讲给予四川学生界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于他而言则是“有生以来所接受的第一次的政治训练”。在刘子通的指导下，成都学潮运动开展得“井井有条”，斗争方法和策略得当，刘子通却因此被军警带走，遭四川总督赵尔巽驱逐出境。

在成都同盟会友人的营救下，刘子通潜回湖北。在好友日知会会员张纯一的介绍下，到武昌文华书院教书。1911 年武昌首义后，刘子通与众多革命志士投入首义光复活动。鄂都督府（临时军政府）委以刘子通参谋职，并选派他与黄楚楠等 8 人于 10 月 16 日潜回黄州，组织城内革命人士策动黄州营防驻军兵变。黄州光复后，成立鄂东军政支部，刘子通任行政科长兼交际，与革命党人殷子衡、吴贡三研究讨论《黄州府临时行政章程》，并亲自起草，发布黄州八属（一州七县），作为黄州中华民国新政权施政纲领。

从少年时期接受进步思潮，到青年时期留学日本，直至辛亥革命成功，刘子通坚持不懈传播革命思想，始终活跃在历史的舞台上，为推动社会思想的启蒙，鼓动革命斗争的开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知识分子的文化角色在这一过程中得以转型和成长，从卫道行道型向近代知识型知识分子转变，也意味着以刘子通等为代表的新式知识分子成为中国社会一股蕴藏巨大能量

的新生力量，客观上，为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产生提供了前提条件。

二、积累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准备：教学相长中的世界观改造

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自身需要马克思主义化，才能进一步传播马克思主义，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是在对众多主义的比较、选择、实践、思辨等一系列复杂的过程中逐渐完成的。“那个时候的中国，社会主义名号之下统摄着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工读主义、新村主义、基尔特主义、合作主义、泛劳动主义，主义与主义之间往往相去甚远。”^{[7] (p405)}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最终被一部分新式知识分子认同，一因其理论本身的科学性具有征服人心的特点，二则在于这部分新式知识分子的信仰建立是基于解决“中国向何处去”而进行的真学真信。刘子通自身的马克思主义化是从研习哲学开始。

当资产阶级的政治实践不能解决中国未来出路时，新知识分子群体经历了一段特别的心路历程，进行了极为艰难的探索。刘子通 1912 年离开湖北军政机关，入武昌中华学校（注：1913 年改为中华大学）任哲学教师。初时，他沉心于佛学研究，试图从宗教式的信仰中寻找救心救世之路，著有《佛学方便论》，他认为佛教最重要的是宣扬平等与博爱，而革命者追求的恰好也包含着这种精神。他还从比较研究的视角，广泛学习其他新思想，学生恽代英称“子通师研究鲁滂（注：指法国哲学家古斯塔夫·勒庞）论极精微，于佛学亦头脑甚清楚，可谓好学深思之成效矣”。^{[8] (p547)} 虽暂时看不到革命的前途，但刘子通“惟教以暂时屏绝人世，静处读书，深宏根器，预储他日拔济之用”；^{[9] (p25-26)} 虽精于佛学，但刘子通的哲学思想并没有走向宗教唯心主义，随着对时局现世的观察思考和对哲学的深入钻研，他的世界观逐渐发生了质的变化。

任教期间，刘子通在学问和思想上与学生平等交流，开湖北学界教学相长之先河。他与学生公开论学，不仅促进了学生的独立思考及思想进步，也进一步改造和丰富了自身的世界观。刘子通是恽代英早期哲学思想形成过程中的良师益友，恽代英在中华大学哲学系读书以及后来留校任教，与“子通师”一直保持学问交流和书信往来。1917 年 3 月，恽代英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物质实在论——哲学问题之研究》，批判西方大哲的四种物质观，阐明自己的物质观，为此刘子通 5 个月中与他进行了 9 次论学。论学主题实质就是马克思主义指出的“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即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师生二人通过“问与答”，对物质和意识及其关系进行了深度分析和辩论，获得了“所往复者，已大段解决，快慰”^{[8] (p321)} 的求知之乐。在论学中，刘子通一方面慢慢接受了恽代英提出的物质实性，“即问物相是否有存在之本体（此条先生与代英皆认为有）”，^{[8] (p241)} 但同时他不认同恽代英所持的不可知论，“此本体实性如何，及其与物相关系如何，是否人智能知也（此条先生与代英各持一说）”，^{[8] (p241)} 刘子通“于科学的物质外，提出主观之观念”，^{[8] (p321)} 认为意识对物质具有积极作用，倾向于可知论。经过刘子通的辨析，恽代英从开始的“物质绝对非人智能知者也”的不可知论转变为“细思之余，不能不略让步”，还言“以研究真理让步者，固不以遁辞为嫌”。^{[8] (p314)} “自与先生论学以来，与佛学渐知其真义，于西哲之说观念较前亦更清楚，此则先生之赐也，尚幸更加教益。”^{[8] (p242)}

与恽代英论学后，刘子通的思想开始向辩证唯物主义转变，他重视实践，强调精神的作用。写给同盟会友人张难先的信中，刘子通认为知识分子在民族危难之时不应执清高之念过甚，“非身置此洪炉大冶之中，莫由知其真际”。^{[9] (p26)} 回答曾在四川任教时的学生宋诚之（时在成都华西协合大学英文系工读）为什么耶稣教不能盛行于中国的问题，刘子通从实践出发分析两个根本原因，其中还对近代哲学的机械唯物主义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学术界有的知识分子“以言西学，……方挟其他人过去之唯物论，以傲乡愚，夸为神圣。除眼见耳闻鼻嗅舌尝皮触而外，不见有他，不信有他，是谓浅薄”。^{[9] (p28)} 与革命友人张海涛切磋信仰追求，刘子通认为“苟有志于切紧为人者，正当忘命一战。期还我本来面目，愿此战中，有许多艰辛曲折”，^{[9] (p29)} 并建议张海涛“试从立诚主敬做去若干时期，则信仰之义，方有商量处”。^{[9] (p30)} 刘子通还以辩证思维看待物质与意识，他说：“在唯物派心理学家，只知意识起于脑筋底作用，好似于这交叉以立底两根树上。这见东边一根树，而以片面底证明，谓此交叉以立者，（他自己并不承认是二木交叉）全是本于这棵树底作用。而唯心派心理学一如佛教唯识宗所说，又偏著眼于意识底精神方面，而几乎只见西边一根树。”^{[10] (p28-29)}

到五四时期，刘子通已具备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他先后在武昌中华大学、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武汉中

学、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等任教，同董必武、陈潭秋、黄负生、恽代英、林育南等一起工作，与陈独秀通信联系，阅读了陈独秀、李大钊等创办的《新青年》《每周评论》《少年世界》等进步刊物，聆听了陈独秀来武汉学界做的三场演讲，逐渐明晰了革命前途和出路。1920年秋，党在湖北的第一个支部——武汉支部（即后来人们通称的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最初成员有董必武、陈潭秋等六人。随即又建立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作为支部进行公开活动的据点，刘子通是最初参加研究会的20余成员之一，研究会两周开会一次，组织学习和讨论马克思主义学说，刘子通遂开始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实践。

辛亥革命后，面临困境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急于在西学的新主义和新思想中找到信仰支撑，但由于自身的理论准备不足、国内危机加剧，他们的观点和方法实际处于频繁的变动中，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也缺乏系统的学习，因此，能最先完成马克思主义化的知识分子数量并不会很多，因为这不仅要有充分的思想基础，还需较高的理论水平。刘子通前有改造客观世界的革命实践，后有教授和研习哲学的经历，他在对东西方哲学的研究积累中，很多观点和方法从学理上已靠近马克思主义哲学，他的理论修养和哲学思想实际超过了同时代很多知识分子。如在五四时期，哲学受科学主义思潮冲击，多数知识分子们主张的唯物主义具有机械性，缺乏辩证法，刘子通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他说：“五官所不能感觉底，便谓空虚无物。实则拿这种标准来判断物之有无，自然是很有缺漏底。”^{[10] (p21)} 因此，在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中，刘子通坚实的理论基础对于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而接受共产主义思想，具有绝对的优势。在加入党组织前，他已基本完成了自身的马克思主义化，成为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批主体。

三、推进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进程：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家

五四以后，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以各种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加快了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1921年春，刘子通在陈潭秋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我党建党时湖北最早的9名党员之一。^{[11] (p9)} 党的“一大”召开后，刘子通参加湖北第一个地方党委——中共武汉地方委员会成立大会。在传播马克思主义、鼓动革命的过程中，刘子通逐渐历练成为我党早期宣传战线上的一名健将。

刘子通以学校为阵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进步学生，壮大革命力量。建党初期，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属经心书院学阀势力掌握的范围，是封建思想统治的一个堡垒。刘子通和陈潭秋、黄负生等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到女师教书，负责发展和培养妇女运动的骨干。他在女师的学生夏之栩、李文宣、徐全直、袁溥之、陈碧兰、杨子烈等，后来都成为我党早期女革命家，刘子通对她们革命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夏之栩回忆，“学校先后聘请了国文教员刘子通同志和英文教员陈潭秋同志，受到他们的革命思想的熏陶，思想上就渐渐地发生了变化”，赞刘子通“思想敏锐，很会讲课”“只要他讲课，其他班上的学生也都跑来听”“选择教学内容时，想方设法把新的文学讲给我们听”，还“讲十月革命和妇女解放等问题”，并称刘子通的“不断启发和诱导，开始从根本上动摇了我们对当时社会的看法，并力求改变社会的现状”。李文宣称刘子通讲授的课程和所写的文章，“是我一生中最早受到的革命启蒙教育，我就是从这里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12] (p26)} 陈碧兰最敬爱的启蒙思想导师是刘子通，刘子通使她们的思想“起了急剧的变化”“获得了多数学生的信仰与拥护”。袁溥之讲到当年在女师读书时，学生们爱听子通老师的课，子通老师向学生传播马列主义，宣传十月革命和妇女解放。曾在武汉中学受教于刘子通的香港学者朱惠清说：“刘子通先生系吾青年时期之良师”“刘先生思想新颖，条理明畅，言辞简练，而意义博雅，同学聆课者，莫不敬仰崇敬，迄今难忘”。^[13]

刘子通在女师教授国文课时，从《新青年》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栏”中挑选有价值的论文和文艺作品作为国文教材，油印发给学生。他鼓励和帮助学生组织各种团体，如学生自治会、演讲会、辩论会和学术研究会，吸引其他班级的学生来参加，像“男女平等”“婚姻自主”等思想都成为演讲会和辩论会的主题，使新思想在学生头脑中逐渐滋生。刘子通还支持进步学生组织的反学校封建管制的学潮，在学校联席会上，他面对打压学潮的学阀势力慷慨而言：“学校的主体是学生，学生的合理要求，学校应多加考虑，对学生的教学方法如果能够逐步改进，教学的质量如果能够逐步提高，对学生的管理方法能够合情合理，学生就不可能不安心求学了。如果把学生的要求置之不理，用高压手段管理学生，那就如校长所说的真正会酿成学潮了。”^{[14] (p378)} 在校外，刘子通和陈潭秋、黄负生一起组织了妇女读书会，把进步学生吸收进来，指导她们系统地学习《共产党宣言》《工钱劳

动与资本》等著作，请董必武、李汉俊为妇女读书会做报告。在刘子通他们的引导下，女师进步青年先后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其中钱瑛、夏之栩、袁溥之、徐全直等后来成了党的骨干。刘子通“在女师的威望很高”，他在女师的这些从教宣传工作打破了女师的封建禁锢，冲击了女师的顽固势力，“所以成了校方和地方保守势力的眼中钉”，^{[12] (p22)}因此校长王式玉组织腐儒遗老向他发起攻击，诬其传播异端邪说，破坏学校秩序，并在1922年初以“宣传赤化”“煽动学潮”罪名解聘刘子通。女师学生强烈反对这一决定，致函王式玉，声明刘子通老师不进教室决不上课，她们包围校长室，罢课至教育厅请愿，举行示威游行活动。女师的这次学潮持续了8个月之久，引起了学界连锁反应，全面拉开了湖北地区的学潮运动，如武汉外语学校为反对校方腐败也掀起了罢课运动；武昌高师学生致电吴佩孚质问其干涉校务；武汉学联不满教育厅长宗彝偏袒王式玉，发出驱逐宗彝的宣言；《江声日报》还为女师学潮加特刊号。女师学潮最终取得阶段性的胜利，这是建党早期妇女运动的先声，在湖北乃至全国都属第一次。这次运动使湖北的军阀守旧势力极度恐慌，督军萧耀南于9月14日下令省城内外所有学校不准延聘刘子通为讲习，将刘子通驱逐出境。

刘子通密切联系实际，联系群众。1920年陈独秀到武汉宣传马克思主义时，非常重视武汉工人情况，特别强调工商业和交通发达的武汉“将来必为全国重要之区”，叮嘱武汉学界深入工厂调研。刘子通在陈独秀的安排下，把目光转向工人阶级，他与陈潭秋、黄负生深入汉口码头，写下了《汉口苦力状况》的调查文章，于1920年9月1日以“刘云生”为笔名（刘，刘子通；云，陈潭秋的字；生，黄负生）发表在《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上。文章对汉口劳动界最苦的、人数众多的驮货一类人的生存状况做了详尽的调查分析，真实地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江岸一隅”的劳动人民“苦痛”“难堪”的生活现状，^[15]达到了揭露现实，唤醒民众的作用，为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作了前期宣传准备工作。

刘子通积极办刊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思想。1921年1月，刘子通和黄负生、陈潭秋等创办了《武汉星期评论》，这是继北京《每周评论》、上海《星期评论》、湖南《湘江评论》之后，又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刊物。《武汉星期评论》的内容极富战斗性，主张改造社会、改造教育、解放妇女，揭露和批判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刘子通既是《武汉星期评论》的主要撰稿人，也是主要编辑，自刘子通和黄负生入党后，《武汉星期评论》实际上成了武汉党组织领导的最早的机关刊物，编辑部与党组织机关同驻一地。党的“一大”代表包惠僧回忆，当时守旧派的刊物《江汉评论周刊》与《武汉星期评论》完全对立，对刘子通的攻击谩骂无所不至。同时期北京《评论之评论》刊物上，时人费觉天评论《武汉星期评论》云：“上海《星期评论》、成都《星期日》也慢慢地不堪恶势力底摧残而夭折了。现在却还有那如日初升，生气勃勃的《武汉星期评论》巍然独存于中国之中，大江之旁。”“该报主撰们说‘我们现在不谈别的，就叫那般可怜虫知道军阀、资本家底坏，是社会害虫’。就这几句话看来，我们因知道这报里现在的方针是怎样。”^[16]从1921年4月开始，《武汉星期评论》还同时由毛泽东主持的长沙文化书社发行，湘鄂两地党组织通过《评论》密切联系。1922年2月毛泽东经过武汉时，在《武汉星期评论》编辑部黄负生的革命大家庭（刘子通、陈潭秋、包惠僧、李汉俊当时都住在这里）里住了半个月，与刘子通、黄负生等畅谈革命事宜。可见，《武汉星期评论》当时在全国已颇有影响力，可谓建党初期湖北的一支战斗号角。

刘子通发挥意见领袖的作用，积极用社会热点引导舆论和民意，组织革命活动。1921年8月13日，刘子通与董必武、张国恩等99人签署的《湖北省立宪讨论会宣言》发表在《汉口新闻报》上，主张湖北自治，反对北洋政府任命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和萧耀南为湖北督军，发出清算前任督军王占元督鄂罪行的呼声。宣言发出，民众称快，第二天，湖北省公会大会就决定清算王占元财产，驱逐拥王罪魁，讨论自治实现方法。1921年9月28日，刘子通联合中华大学校长陈时发起讨论太平洋会议决定。^{[17] (p240)}这一决定发表于《汉口新闻报》上，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响应。刘子通联合湖北教育界名人，要求全市人民团结起来与帝国主义和反动的北洋政府斗争到底。在他的呼吁下，10月3日，由汉口总商会、银行公会、青年会、欧美同学会联合发起的汉口太平洋会议讨论会宣告成立，该会以讨论太平洋会议问题，团结民气作为此次太平洋会议中国代表声援的宗旨，并于26日发表宣言书草案。先后还有省议会、全省自治研究会为太平洋会议发电，请列会代表不畏强御，据理力争国权。太平洋会议召开的第二天即11月15日，刘子通参与组织武汉学界大游行。虽然最终中国在太平洋会议外交失败，但是这场由舆论发起的民意活动凝聚了人心，也让民众认清了北洋政府的无能和帝国主义无耻的嘴脸。1923年“二七大罢工”被镇压，惨案发生后，在北京工作的刘子通和包惠僧动员湖北在京国会议员胡鄂公、彭吾先、吴昆等人到参众两院请愿，并提出劳动法草案，争取工人应享有集会、结社和罢工的自由。要求两院弹劾镇压“二七大罢工”的罪魁吴佩孚、萧耀南。

刘子通积极壮大党的队伍。1922年春，刘子通介绍自己的学生兼同乡马哲民入党，马哲民后与陈潭秋一起创办湖北人民通讯社。1923年春，被萧耀南驱逐的刘子通在李大钊介绍下已在民国政府教育部工作，此时，他和共产主义同志会的湖北同乡、国会议员胡鄂公交好。胡鄂公思想进步，与熊得山、邝摩汉主办《今日》杂志，宣传社会主义，刘子通和瞿秋白经过斡旋，成功说服胡鄂公等人解散同志会，同志会全体成员集体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8]

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是一个只有几十个人的小党，理论水平还不高，对中国革命还没有形成成熟的思想，因此这一时期的探索和实践在整个党的发展历程中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是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正确认识和积累经验的重要阶段。在这一时期，作为先进知识分子的共产党员刘子通是最早一批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精英群体。“南陈北李中刘”之“中刘”一说还有待继续深入研究，但从刘子通在建党初期所做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工作看，从他在湖北学生界的影响力看，特别是生命后期，因《武汉星期评论》的另一重要编辑黄负生病逝，刘子通负责整个刊物的编辑，又在武汉中学教书，还要参加社会活动，并且不久遭督军驱逐，极为繁重的工作担子使他积劳成疾，这些都是极为有力的佐证。毛泽东称陈独秀是“思想界的明星”，陈独秀曾因宣传马克思主义被捕坐牢，而刘子通在20世纪20年代堪称湖北学生界的旗帜人物，也因宣传马克思主义而“厄于顽固党”，^{[5] (p99)}是马克思主义的真战士，对传播马克思主义做出了重要贡献。

四、彰显马克思主义革命性的特殊贡献：力推湖北教育革新

辛亥革命以后，是湖北教育早期现代化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一时期，湖北新旧教育的转型经历了艰难复杂的过程。民初政局动荡，湖北的封建顽固势力一度掌控教育领域。以刘子通为代表的新知识分子阶层，与封建反动势力在思想领域进行着激烈的斗争，表现出对旧事物不合理的批判性和决不同封建反动势力相妥协的革命性。

自日本留学归来，刘子通绝大部分时间在教育战线工作。他关注教育思想，曾译《人格的教育学思潮》。^[19]（注：此书尚未找到，据研究，应是日本学界翻译美国教育类书籍，刘子通转译）创办《武汉星期评论》即是以“改造湖北教育及社会为宗旨”。尽管生平著作多数未保存下来，但窥斑见豹，在湖北学界，刘子通的学识得到同时代人的充分肯定。儒学大师熊十力，在《熊子真心书》中谓：“余廿年严惮之友，以仲如与同县刘通为最。子通天资卓绝，仲如践履笃实，皆余所不逮”。1917年3月5日，与刘子通还不相识的陈独秀专门写信给恽代英“问刘子通先生学识”^{[8] (p621)}可知刘子通的思想 and 学问在当时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受到知识界精英群体的关注。在建党早期，刘子通已是湖北教育界名人，凡教育界重大活动基本都有他的参与，凡教育界重要发声他在其中。刘子通还有任职教育管理的经历，1917年10月，新上任河南省教育厅长的鄂人覃孝方邀请刘子通赴豫就职，此时至次年12月，刘子通在河南教育厅担任秘书，其间对河南农村开展过教育调查，他比照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颁布的教育法令，分析河南农村教育的现状，发现农村教育体系仍为封建旧学，学生仍读孔孟之书，农村教育大权仍掌握在封建遗老手中，这与民国教育法令大相径庭。以上均为刘子通推动湖北教育革新奠定了思想和实践基础。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湖北大事记》（1911.10—1926.10），有关教育改革的大事仅有几条记录，其中之一为“1921年11月19日，《武汉星期评论》第三十三至三十七号，连载了刘子通的《改良湖北教育意见书》”。^{[17] (p243)}《意见书》是刘子通教育革新思想的代表作，另还有发表在《武汉星期评论》第三十六号上的《我们应有最小限度的三种觉悟》，也是他对教育改革的思考。《武汉星期评论》保存不全，其他期数上是否还有他的关于教育改革的文章，目前无从查证。仅就《改良湖北教育意见书》来看，有完整的改革纲要，虽因顽党反对并驱逐等各种原因，意见书内容未登全，但《意见书》是建党后最早的、较全面系统对湖北教育提出改革思路和举措的文本。《意见书》在发表前，还送给党的“一大”代表陈潭秋和当时教育界的名人杨一如、刘觉民等人阅读，并融合了他们的一些意见。

其一，在提出改革意见前，他已注意到教育的本土化问题。清末以降，我国教育制度存在着大量移植日本模式的现象，后又转向效法美国模式，刘子通认为“部颁教育法规，多系抄自日本，并非斟酌国情”，^[20]应针对湖北教育目前弊端进行改革。

其二，在改革教育制度方面，刘子通积极呼应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中国化，大力提倡“扩充男女共学”。“男女同学”的

呼声始于清末，然而实现起来阻力重重，其间经历了长期反复的激烈争论。湖北虽广开新学，然而封建顽固势力坚持不让步，即便是省会武汉也未开新风，女子学堂极少，亦无入大学教育之机会，乡村守旧更甚。刘子通认为男女共学“为增高妇女人格的地位之根本方法，众所共知，无取词费”，提出“扩大男女共学之机会，此如武昌高等师范尤亟须开放”“改留学男女名额之规定”^[20]等。武昌高师是当时湖北唯一的官办大学，但不招女生，因此湖北女子最多只能读完中学或初级师范，极少数能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意见书》发出的次年9月，武昌高师首次招收女生，实行混合编班，开全省男女学生同校之风，这是刘子通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长期斗争的结果。刘子通认识到学校的文化传播作用，还提出“实行学区制将文化中心散居各地方”的建议，注重教育的均衡发展。他说“学校原为文化中心，新社会之模范也，今欲发展地方文化，则中等学校，理应分设各处”。当时，全省中等师范不足10所，其余均是培养技术人才的实业学校，刘子通提出将“全省划为十学区”“每区设一‘中师学校’”，^[20]这样每区就有了文化中心。

其三，在改革教学内容方面，刘子通极其重视教材和教法。他在女师教授国文课时，学生称他与以前的老学究作风完全不同，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提倡白话文，丰富教材内容，采用启发式等教学方法，内容吸引人，学生喜欢听。他认为教师是教导学生的，不是发表学问的，所以学问纵然再丰富，若是教法不良，就不是个完全的教师。他批评大部分湖北小学把陈腐教案当作金科玉律，还在用注入式教学；中等学校把二十多年前的课本重印几遍，上课就是念念教科书。他倡导教员要学习教育新思潮，“由注入的变而为启发的，由启发的再变而为发现的，而今又三变而为设计教学了”。在《意见书》中，他注重提高学生的主体能力，他说“‘自动教育’四字，湖北教界非不闻知，惟实施此旨者，殆绝无之”“教习不宜漫为讲演”，要学会采取“讨论式”，中等以上学校教师“凡有该科最新撰著之见于报章、杂志者，即时择印，散给学生，以资研究”。^[20]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当时刘子通已具备现代教育的理念。

其四，在教育管理方面，刘子通提倡废止学监，实行级任制。学生管理是当时教育界争论的热点问题，清末学校设置的学监对学生管理方式以管训为主，不包括教学，是负责班级管理的专门人员，其主要目的在于控制学生的思想与行为，所以他们经常对学生施以权威和压制。由于这一体制与学生的矛盾日益尖锐，民国初年，教育部对此进行了改革，出现了学监制、级任制和训育导师制并存的局面。湖北的部分学校还是沿用学监制，而“中等学校，虽已偏置级任，然大都有名无实”，学监与学生“彼此猜嫌对付，貌合神离，甚至互相诋骂，宛如仇敌”，^[20]所以刘子通“斟酌鄂省教育现况”后，从级任的资格、职务及权限、待遇及限制三方面对级任制的改革做了详细的建议。特别是他关于级任资格的意见，从人格修养和知识结构对级任教师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并从报酬上把级任的权责统一起来。这种设计体现出很强的科学性，是对20世纪20年代湖北教育管理极为有益的探索。

其五，刘子通改革的重点还有学生的德性训练问题。他认为“湖北学校之于训练废弛极矣”“知识、技能愈形发达，愈有需于德性之修养，以资调整，否则，知识愈增，私欲愈强，技能益精，作恶益巧”，所以“训练宜居学校教育中坚”。他指出训练者的核心素质为“教育学的知识，人格的示范，普通学识及常识”，社会变化快，应组织训练研究会，“随时研究，随时试行，而随时改良”，^[20]学校训练要以学生的德性和才干为内容。这一思想与现代社会提倡的“养成教育”极为相似。

湖北教育自近代以来，长盛不衰，与不同时代教育人的辛勤耕耘有直接的关系。刘子通在湖北教育变革转型的重要时期，认识到“自己所处地位的责任的重大”，^[21]以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性直面湖北教育的弊端，他的教育革新思想，从中国教育及湖北教育的实际情况出发，立足于人的思想解放和全面发展，追求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统一，体现了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代表他教育改革理想的《改良湖北教育意见书》是剑指当时湖北教育腐滞不前的一篇战斗檄文，历史如何向前发展，也淹没了这位湖北近代教育改革先锋的声音。

1924年春，刘子通因严重的肺病逝世于家乡，1945年6月被中共中央组织部列入《死难烈士英名录（1921—1945）》。我们在有限的历史资料中梳理他短暂的一生时，看到的是无限的精神和不朽的形象，这是百年前那些为中华民族奋斗不已的先辈们的缩影。刘子通的个体实践，记录了近代中国社会最早一批新知识分子，对中国革命道路所做的开创性贡献，对于社会的思想启蒙、革命意识的培养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书写了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的必然篇章，

彰显出知识分子在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中的主体地位。

参考文献:

- [1]王金铨.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轨迹[J], 史学集刊, 1988, (2).
- [2]黄冈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黄州府志(点校本)·光绪(中)[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8.
- [3]陈学恂, 田正平.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7.
- [4]孙中山. 孙中山全集: 第3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 [5]张难先. 湖北革命知之录[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
- [6]郭沫若. 少年时代[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 [7]陈旭麓.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 [8]恽代英. 恽代英全集: 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1.
- [9]刘子通. 与人论学书[J]. 光华学报, 1918, (3).
- [10]刘子通. 意识浅说[J]. 海潮音[J]. 1920, (8).
- [11]何浩, 农永清. 马克思主义在武汉地区的早期传播[A]. 楚晖 2[C].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1.
- [12]李文宜. 李文宜回忆录[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4.
- [13]黄州政坛文史委. 黄州文史资料总第五辑: 纪念辛亥革命 80 周年[Z]. 1991.
- [14]包惠僧. 包惠僧回忆录[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3.
- [15]刘云生. 汉口苦力状况[J]. 新青年, 1920, (9), 第八卷第一号.
- [16]觉天. 评《武汉星期评论》[N]. 评论之评论, 1923, 第一卷第四号.
- [17]湖北文史委.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湖北大事记专辑[Z]. 1988.
- [18]胡鄂公. 纪念熊得山先生[N]. 申报, 1941-02-12(7).
- [19]刘子通. 改革湖北教育意见书[N]. 武汉星期评论, 1921-12-10(2).
- [20]刘子通. 改革湖北教育意见书[N]. 武汉星期评论, 1921-11-19(2).

[21]刘子通. 我们应有“最小限度的三种觉悟” [N]. 武汉星期评论, 1921-12-10(1).